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中传统文化资本的独特价值

邵明华^{1,2} 高 洋¹

(1. 山东大学 历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01)

摘 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文化资本,区别于西方人文经济学。结合文化经济学广义狭义说、布迪厄文化资本三形态说以及思罗斯比文化资本存量流量说,构建了“文化(经济伦理)—经济(劳动对象)—人(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中传统文化资本的独特价值。在经济伦理层面,以人为本的民本经济观念、守诺互利的诚信经营理念、贵和尚中的和合共生文化与贫富调节的大同发展追求等精神文化资本,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修正工具理性的传统人文精神;在劳动对象层面,作为内容生产来源的无形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外显的有形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活动的行为文化资源等资源文化资本,为人文经济学供给了满足文化生产消费需求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人力资本层面,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制度化传承的文化技能与师古不泥古的文化自觉等具身文化资本,为人文经济学培育了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人力资本。

关键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传统文化资本;经济伦理;文化资源;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邵明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研究;高洋,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研究。

基金项目: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数字文化产业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4CXWHJ12)、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项目编号:23ZDA08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0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5)03-0011-10

DOI:10.19563/j.cnki.sdzs.2025.03.002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苏州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②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③。这些

①②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第1版。

③《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人民日报》2025年3月6日,第1版。

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是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同于西方人文经济学,是“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经济学”^①。西方人文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 或 Humanomics)则强调经济发展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经济结构。尽管古典经济学曾对文化因素加以考量^②,但数量分析、价值中立等学科取向以及“文化迷雾”“文化优劣陷阱”等主客观难题,使经济学“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对文化这一重要社会发展影响因素的关注”^③。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正式对人文经济学进行理论探索。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反思了现代经济的工具理性逻辑之后,呼吁正视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的非经济价值——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有化所涉及的不单单是经济,更有文化。^④马克·卢茨(Mark A. Lutz)和肯尼斯·卢克斯(Kenneth Lux)则正式提出了人文经济学概念,认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将文化等非理性因素从经济分析中驱逐出去。二人从欲望与需求之别人手,以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论替换功利主义学说,肯定人的多样需求以及人性本身。^⑤但此项研究并未获得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近年来,亦有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人文经济学之价值,认为人文经济学能够使人实现自身潜能进而获得尊严与发展,当为21世纪经济发展范式。^⑥以人的需求为中心的西方人文经济学并未对人文经济学中人文与经济的关系进行集中研究。

几乎与舒马赫同时,西方文化经济学界亦发出“经济学是如何成为一门几乎去除任何文化背景的抽象学科”^⑦之问,反思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经济学包括广义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ics)与狭义文化经济学(Economics of Culture)两种逻辑:前者研究文化差异作为一种变量对经济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后者则关注文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如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对艺术产业的讨论。^⑧这为探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中人文与经济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不同于西方人文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与人文主义传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在一定人文环境中变化或运动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为人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投入与积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亦然。资本是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所需的材料,不同类型资本对生产活动形成相应约束。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态,其中文化资本包括具身化形态(Embodied State)、客观化形态(Objectified State)与制度化形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⑨传统经济学以经济资本解释世界,文化资本则是对非经济化、超功利性资本类型的补充,极具人文经济学价值。但由于文化资本内涵较为丰富,自提出之后其定义便被不断扩展与反思。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便将文化资本从社会学领域扩展至经济学领域,看到文化资本存量(Stock)生成流量(Flow)的可能,“为从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分析文化商品、文化服务、文化行为及其他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成为衔接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中间概念——文化资本除拥有资本形态的

①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华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②Smith V L, Wilson B J. *Humanomics: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6.

③魏建:《增长共识理论:人文经济学之核心》,《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第84-91页。

④Schumacher E F.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 Row, 1973, p. 245.

⑤Wisman J D. The Challeng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80, 14(1), pp. 227-230; Lutz M A, Lux K.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New Challenge*. Bootstrap Press, 1988, pp. 5-7.

⑥Komlos J. Humanistic Economic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21st Century.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21, 96, pp. 184-202.

⑦Boulding K E.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Cultural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2, 53(2), pp. 267-284.

⑧梁碧波:《文化经济学:两种不同的演进路径》,《学术交流》2010年第6期,第74-78页。

⑨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Granovetter M, Swedberg R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Routledge, 2018, pp. 78-92.

全部经济价值外“还体现、贮存并提供文化价值”。^①

人文经济学以人文底色区别于传统经济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区别于西方人文经济学的特有人文底色是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文基因’,往往蕴含在其优秀传统文化中”^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特有人文底色即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传统文化资本具有双重内涵。首先,传统文化资本指教育领域相对于近代西式教育而言的传统教育制度,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经学等。^③其次,传统文化资本指经济活动中作为资本形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下简称“人文经济学”)的传统文化资本便属于第二种内涵。结合文化经济学广义狭义说、布迪厄文化资本三形态说以及思罗斯比文化资本存量流量说,本文构建了“文化(经济伦理)—经济(劳动对象)—人(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从精神文化资本、资源文化资本与具身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分析人文经济学中传统文化资本的独特价值。

一、经济伦理:作为精神文化资本的传统人文精神

“在经济学研究的更高的层次上,即在研究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之上,还存在着一个对人的研究的领域。”^⑤经济学的本质是人学,而人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作为价值观念具有经济伦理功效,以一种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约束影响经济活动中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⑥的指示,可将人文经济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以人为本的民本经济观念

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即注重人性、以人为本,其在西方为人本主义,在中国则具有深厚的民本主义传统。民本思想始终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人为本”(《管子·霸言》)等政治理念左右生产活动。从近代的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执政理念,民本始终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观念制约并指导经济活动。除了作为政治理念影响经济活动,民本思想自身亦具有民本经济的内涵。

“经济”一词在中国古代便指向“经世济民”。民本经济观念是民本思想中直接作为经济理念的部分,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民众利益以及求利行为的肯定,二是政府鼓励生产、轻徭薄赋以发展经济。在第一个层次上,肯定民众利益及求利行为首先要看到自利人性,“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的私利”^⑦。子产谓之“无欲实难”并主张“皆得其欲”(《左传·襄公三十年》),管子亦言“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管子·禁藏》),子产同时以“民不可逞”对民众欲望进行一定限制,这与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旨趣相近,孔子亦称子产“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荀子则进一步看到君子小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荀子·荣辱》)之共性。第二个层次主要体现为发展民业、爱惜民力。人口增加后,孔子主张“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孟子则将“富之”具体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的“养民”理念。此外还有徭赋内容,有若在回答鲁哀公灾年如何征

①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9页。

②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1-19页。

③张淑娟:《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晋阳学刊》2003年第6期,第68-71页。

④何劭明:《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学理论》2009年第14期,第69-70页;李娟伟、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是传统文化还是商业精神?——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科学》2013年第4期,第5-15页。

⑤厉以宁:《沉沙无意却成洲: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底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页。

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党建》2014年第3期,第4、6页。

⑦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税时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管仲同样主张“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的藏富于民观念,孟子亦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黄宗羲更以“积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痛斥历代效果有限的税赋改革。以上两个层面构成了民本经济不以逐利为唯一事功,寻求“义利并举”的惠民、养民与富民底色。

(二) 守诺互利的诚信经营理念

如果说民本经济是人文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那么在微观经济领域,人文经济学则更多体现为经济行为主体的诚信经营。余英时便认为“诚信”“不欺”是明清商人伦理的中心德目。^①“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诚信自古便被儒家视为为人根本、立身之基。荀子直言“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荀子·王霸》),管子则更为明确地要求“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管子·乘马》)。除了各家经典,古代蒙学读物、民间俗语等同样将诚信经营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加以传承,典型的便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

儒商精神要求“诚信中和,礼义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与贾业良性互动,热心社会公益之事”^②,诚信经营作为儒商精神的重要内涵,是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重要的一种企业家精神。诚信经营以诚信内核对经营主体作出伦理要求,阐明了中国古代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文化属性。“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主义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③,这为经营主体设定了物质与欲望的“上限”。这同样是一种执两用中、无过不及的中庸智慧,以诚信经营弥补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不足,调节经济发展中的利益矛盾,通过“义以生利”的经营方式提高企业成长绩效。^④在诚信经营这一整体要求之下,鲁商精神、晋商精神、徽商精神、潮商精神与浙商精神等地域性商业文化表达,也多有各自具体的诚信经营内涵,对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发挥给予区域文化支持,如人文经济学的苏州实践便是苏商精神的具体展现。

(三) 贵和尚中的和合共生文化

和合理念作为中华“和”文化核心,为处理个体内部、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间关系提供了文化引导。“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⑤有学者将和合视作“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⑥后走向和谐并产生新事物的过程,并以此提出由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中观经济学等组成的“和合经济学”^⑦,但并未就和合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具体关系进行分析。下文从个体内部、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重维度讨论和合文化的人文经济学价值。

首先是个体内部的和合。集中表现为个人私欲与伦理道德间的“义利之辨”。儒家早期经典多将义利分开讨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但同时期的“义,利也”(《墨子·经上》)与明晚期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都在求利与守德矛盾中走向“义利并举”。其次是个体与社会间的和合。和合文化要求个人

①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234页。

②周生春、杨纛:《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52-158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1页。

④何轩:《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检验——关于中庸理性与儒商精神的探索性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17页。

⑤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⑥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⑦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7-598、612、627页。

之利与社会之利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统一,如儒家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种群己关系亦被宋明理学纳入“义利之辨”中。^①墨子由“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来论证“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从利己走向互利。清代儒学同样主张私欲与公利的统一:“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日知录》卷三《言私其黷》)最后是社会与自然间的和合。“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照自然的文化基调。“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逸周书·大聚》)、“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山泽各致其时”(《国语·齐语》)以及历代山林封育制度等,均将节制作为调和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重点。

(四) 贫富调节的大同发展追求

贫富调节理念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人文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舒马赫在反思传统经济学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时,曾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国有企业抱有变革期待,因为社会主义以占社会群体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为发展成果共享对象,而非少数企业家。^②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周易·益卦》)、“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滕文公上》)以及春秋时期的大同理念,到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的“均天下”理想,都展现出平等与共享之价值内核:经济发展不应一味追求数量而在于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追求中获得了时代生命力与实践可行性。

贫富调节的前提是荀子所谓明分使群。“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国》),贫富调节不是无节制地随意分配,而要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情况的清晰厘定,正所谓“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管子·乘马》)、“权有无”而“均贫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确定差距才能给定合理的调节力度与方式,实现“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汉书·董仲舒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贫富调节的第一种方式是平均主义,即“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古代社会针对贫富调节制定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政策,如唐代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明代由“两税法”到“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税制改革等,尽管多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但缩减贫富差距、缓解财政危机无疑是其重要初衷。^③但是以上改革都受到封建制度限制,难以治本。第二种方式更为根本,以富民养民理念提升社会生产力,增加财富总量后再做调节。“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六韬·文韬》),在国富同时实现民富,“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开展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便是实例。

二、劳动对象:作为资源文化资本的传统文化资源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判断除了彰显文化的经济伦理价值,也展现出人文经济学中文化作为劳动对象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发展逻辑。这一过程在人文经济学中可被凝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化、商品化与产业化。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为中国发展人文经济学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积累,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提供了文化资源支持。“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④,其中“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劳动对象”^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化、商品化与产业化“以文化资源为基础,以文化创新为动力,以文化科技为手段,以文化保护为核心,以文化传承为目标”^⑥,反对经济逻辑侵害文化价值。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具有不同形态特征,

① 萧伯符:《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论纲》,《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第9-14页。

② Schumacher E. F.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 Row, 1973, pp. 239-245.

③ 赵兴罗:《从历代财税改革看公平正义——古代调均贫富和均平赋税的思想及实践》,《财政监督》2014年第18期,第11-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⑤ 丹增:《文化生产力及其发展问题》,《求是》2007年第9期,第52-54页。

⑥ 邢楠:《我国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研究》,《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第82-88页。

人文经济学要求生产者、管理者立足文化资源形态差异从事文化生产与保护,实现传统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从无形文化资源、有形文化资源以及行为文化资源三种形态(表1),分析人文经济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资源文化资本的具体类别。

表1 传统文化资源类型特征及主要形态

	虚实特征	动静特征	样式特征	主要形态
无形文化资源	非实体	偏静态	重文本	民族文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词歌赋、古今历史、符号意象、影音资料等
有形文化资源	偏实体	偏静态	重形式	历史文物、历史遗存等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
行为文化资源	非实体	偏动态	重实践	歌舞曲艺、生产技艺、武术体育、生活民俗等

(一) 作为内容生产来源的无形文化资源

无形文化资源主要指民族文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词歌赋、古今历史、符号意象、影音资料等非实体、偏静态、重文本类资源。它集中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文化思想与思维方式等内容,表现为符号、故事和世界观等要素,可被用以创制文化产品。无形文化资源与劳动、物质投入相结合,产出文化产品供人消费。中国的神话传说等各类无形文化资源,数量庞大到无确切数字。如近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新神榜:杨戬》《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封神题材文化产品崛起后,呼吁打造“封神宇宙”“封神 IP”之声不绝于耳。《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长安三万里》等现象级动画电影,无一不是取材于无形文化资源。具体到人文经济学样本苏州而言,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转引的谚语“天上天堂,地下苏杭”成为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来源并激起民众文化想象,带动人文经济发展。放眼中华文化,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诗词歌赋、四大名著所涉及文化资源可谓“无尽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亦属罕见。

无形文化资源的海量存量为人文经济实现文化资本流量增值奠定了内容基础。这与无形文化资源自身优势密不可分。它的无形特征为资源化提供了最小内容限制与最大内容便利:首先,相关文艺作品多因年代久远而进入公共版权领域,属于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文化资源,知识产权争议最小;其次,无形文化资源的传承能力最强、传承范围最广,具备标准化潜力,更易突破文化资源时空局限走向产品形态;最后,无形文化资源中文化的符号性要素远多于功能性要素,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受到的形式阻碍要小很多。但在以上优势之外,它同样因无形特征而对文化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创意转化能力要求。

(二) 作为经济价值外显的有形文化资源

有形文化资源主要指历史文物、历史遗存等在历史中保存至今的偏实体、偏静态、重形式类资源。它主要由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构成,具有客观化形态的存在特征,直观展现了文化价值中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原真价值。它更以突出的经济价值区别于无形文化资源和行为文化资源,借助文化价值实现经济增值。我国文化资本存量中的有形文化资源同样规模庞大。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我国拥有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世界遗产57处以及各类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①另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3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仅苏州一地,

^①《国家文物局:目前我国拥有57处世界遗产,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载央视网2023年10月30日,<https://news.cctv.com/2023/10/30/ARTITkji9XSviXkm27AOfvXj231030.shtml>,2024年11月5日访问。

便坐拥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居全国各地级市前列。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致力于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和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必将进一步加快有形文化资源在创意转化后的文化资本增值速度。

有形文化资源由存量转为流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实物的模仿与复制,二是实物符号化后的创意转化,即有形文化资源无形化后的再生产。有形文化资源具有突出的形式特征,“哪怕具体的形式本身并没有什么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有功能意义的”^①,这种功能意义进一步构成了符号性要素,使之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受到一定的转化与发展局限。此处以博物馆文创为例说明有形文化资源的两种流量转化方式:一类是等比例缩放后的艺术复制品;另一类将文化资源中文化元素进行筛选、提取、创意转化后,重组符号性要素与功能性要素关系,赋予文化符号新功能。截至2023年末,全国文物机构藏品数量为5017.2万件/套,与英美等西方强国在数量上仍有较大差距,但仅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开发种类便超过12.4万种,实际收入超过11亿元。其中苏州博物馆在全国文博单位中较早组建了系统开发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文创部,早在2011年便开设线上商店,商品数量位居全国博物馆前列,打造出“吴门四家”等多个系列文创品类。在文物之外,有形文化资源还包括自然文化资源这一特殊类型,如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与武夷山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此类文化资源可通过文旅融合参与经济活动。

(三)作为文化生产活动的行为文化资源

思罗斯比亦曾以是否有形为标准对文化资本进行分类,忽略了连接无形与有形的人及其行为。而人文的回归正是人文经济学关键。这里将歌舞曲艺、生产技艺、武术体育、生活民俗等非实体、偏动态、重实践类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第三种类别——行为文化资源。它是对无形文化资源、有形文化资源和人的综合调动。前两类文化资源都可以脱离人而被劳动对象化,唯独行为文化资源必须经由劳动者自身才能展现,如故事与说书、戏文与戏曲、乐谱与音乐、药方与中医、丝绸与缂丝等,便具有“无形或有形文化资源—行为文化资源”的连接关系。行为文化资源除了作为文化生产活动,还可以通过符号意象、影音资料等无形文化资源参与下一轮文化生产。从外延来看,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大重合性。除去更多带有无形文化资源特点的“民间文学”类别,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3300余项(子项),类型丰富且遍布全国。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是语言。语言以说话的动态区别于文字的静态,可通过文字参与经济活动,如各类消费场景中的方言文案、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电影等。

行为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产活动。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模式,主张在生产中实现保护传承。行为文化资源的经济参与是一种认同性经济,在经济价值之外,还发挥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的巨大文化价值。^②生产性保护可拓展为生活性保护,在“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等人文经济理念下,使行为文化资源重回民众日常生活。^③2014年,苏州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被授予“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荣誉,行为文化资源日益融入城市生活。在我国44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中,苏州入选8个相关非遗项目,另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3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称:“如果我们将全国的工艺美术集合起来找个地方安家,那么苏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④苏州丰富的行为文化资源,催生了以苏绣、核雕、玉

①彼得·里克森、罗伯特·博伊德:《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陈姝、吴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

②田兆元:《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8-96页。

③胡惠林、王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转向“生活性保护”》,《艺术百家》2013年第4期,第19-25页。

④《苏州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新闻发布会》,载苏州市人民政府网2014年12月11日,https://www.suzhou.gov.cn/szsrnz/sjxwfb/201412/65b399c2c64b498aad717bdad9e3fec3.shtml,2024年11月2日访问。

雕、砖雕等工艺美术作品为核心产品的文化企业,资源潜力可见一斑。

三、人力资本:作为具身文化资本的传统文化素养

人文经济学的人力资本并非毫无差异的“经济人”,而是有着各种观念的“文化人”,这决定了各国的人文经济学道路是不同的。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人力资本广泛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身化形态,构成了特有的人力资本。具身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作为实践主体所持有的观念、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技能等文化存量总和。类似思罗斯比的判断,它与人力资本概念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是非常接近的”^①。“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结构,是观念和价值观的组合,这些观念和价值观塑造了群体的身份和凝聚力,并发起了使这种身份永久化的行动。”^②具身文化资本紧密依附于实践主体,使人能将精神文化资本应用于经济活动,推动资源文化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对象化。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③。这种文化传统将文化基因、文化技能和文化自觉分别固定为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观念、知识与创新三重人力资本,内化于人文经济实践主体之中。

(一)观念人力资本: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作为观念人力资本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人文底色。“‘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④,以文化基因形式实现传承积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⑤成长于儒家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在基本认知上同西方人存在显著差异。^⑥如中国的文化观念,来自“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后经“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形成合用,其中的教化内涵极富人文特色。《周易》称“文明以止,人文也”,同样蕴含中庸理念与和合文化。

除了精神文化资本的传承,“人文化成”还为资源文化资本的效益评价提供了传统观念。中国人在利用资源文化资本时,有关文化的兴观群怨、文质关系等观念,可以有效防止人文经济学回归传统经济学。《诗经》是中国早期文艺作品的代表之一,孔子称之为可以“兴观群怨”,构成了诗歌等文艺作品社会效益的经典表达。《文心雕龙》评价文学创作的“六观”标准,以及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理念,都是对“兴观群怨”的继承发展,丰富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认知与评价观念。此外,文质之辨亦有助于辩证看待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资源文化资本的利用除了要在经济层面规避工具理性,更要在文化层面高扬价值理性,这两个层面都受创作主体、评论主体、消费主体与管理主体的文化观念影响。类似文化基因均构成了中国人文经济学特有的观念人力资本。

(二)知识人力资本:制度化传承的文化技能

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传承有其自发的一面,但更多源于重教传统的自觉。重教传统将文化技能“通过教育培训”等制度化形式累积为“具有某种专业知识”^⑦的知识人力资本。这为中国人文经济发展培养了

①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②Ellis S M. “‘Intangible’ Cultural Resources: Values are in the Mind”, in King T F (ed.).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iley-Blackwell, 2011, pp.156-171.

③习近平:《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人民日报》2022年9月27日,第1版。

④⑦张佑林:《传统文化及观念人力资本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渊源分析》,《商业研究》2005年第14期,第68-72页。

⑤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⑥Nisbett R E, et al.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2), pp.291-310.

数以亿计的实践主体。学历教育作为布迪厄文化资本中的制度化形态,是对具身化形态的承认与固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整合能力,源于所受教育中文化技能的应用。文化技能包括多个层次,基础的如说中国话、写中国字、过中国节等,专业的如曲艺、书法等行为文化资源。中国的重教传统,使教育普及、师徒传承较其他地区更具文化优势。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使“重教”成为此后儒家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孟子更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视作君子三乐之一。这种重教传统还体现于明清商人重教兴学、捐助学校的社会风尚中。^①除了儒家经典、学校体制对文化技能的传承,重教传统还有助于传统手工艺等行为文化资源的师徒传承。

重教传统保障了文化技能在教育制度中的具身化与资本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②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正是重教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为人文经济学传承创新传统文化资本提供了文教保障。《意见》将教育普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七大重点任务之二。

(三)创新人力资本:师古不泥古的文化自觉

历代中国人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既创制了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的各类精神文化资本和资源文化资本,也激励着中国人将各类文化资本应用于人文经济学以开创新功。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③。首先,这一“明白”过程隐含含有记录与创作的参与意义。《左传》将“立言”称为“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张载更将“为往圣继绝学”看作士人毕生志向,黄宗羲等则把著书立说视为延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④在历代官修史书之外还存有大量的地方志书和私修史书,共同构成了“历史作家”这一文化自觉群体,形成了中国的文化自觉传统。《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便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其次,文化自觉要求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周易》的易变理念对文化创新同样有效,萧子显曾直言文学创作“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叶燮更是认为“变能启盛”(《原诗·内篇上》),与“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旨趣相近,实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芥舟学画编·摹古》)。最后,这种文化自觉传统还带有不同文化接触后的汇通色彩。这既包括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交流,也有中华民族向异域民族学习后的博采众长,精神或资源文化资本中不乏敦煌文化、禅宗哲学、纺织技艺等类似文明成果。

文化自觉传统除了作为文化观念传承至今,还通过各种政策与制度提升具身化效率,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人力资本支持。习近平文化思想便是其在新时代最集中的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都要求中国人在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将各类文化资本融入人文经济学实践,真正打通了精神文化资本、资源文化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时空隔阂,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四、余论

中国的人文经济学是区别于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底色,这种底色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资本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持续发

①孙华堂:《论明清商人重教兴学及其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42-546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③费孝通、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展的价值储备,但在实践运用中亦需注意两点挑战。首先是对“文化决定论”的防范。人文经济学的重要价值在于走出“经济决定论”而回归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绝不意味着社会发展要走向“文化决定经济”或“文化决定制度”式的“文化决定论”。防范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内涵,另一方面要切实体悟精神文化资本中的和合文化,避免经济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极端处理。第二点挑战在于,资源文化资本经由产业逻辑发展人文经济学时,一定要避免陷入工具理性损伤价值理性的反人文经济学误区。我们要承认各类文化资源的差异性,看到人文经济学因正视文化差异而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最大限度地文化生产中丰富这种差异性。文化资源的差异性为人文经济学中文化产品的多样性、新颖性和突出性创新提供了创意支持,有助于避免文化的雷同与平庸,保证人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赵 强]

Empower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e: The Unique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in Humanistic Economics of the New Era

SHAO Ming-hua^{1,2} GAO Yang¹

(1.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2.Research Centre for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Jinan Shandong 250001, China)

Abstract: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distinguished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regards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vital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 Integrating the broad and narrow definitions of cultural economics, Bourdieu's theory of the three forms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rosby's conceptualiz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s stock and flow,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e (economic ethics) — Economy (labor objects) — Human (human capital)" to analyze the unique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within the context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First, in terms of economic ethics, the people-centered economic ideals, the philosophy of good faith and mutual benefit in business,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symbiosis, and the pursuit of equitable development, as forms of spiritual cultural capital, provide a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pirit that corrects the overemphasis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econd, in terms of labor objects, intangible cultural resources as sources of content production, tangible cultural resources as manifestations of economic value, and behavioral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supply humanistic economic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inally,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unique cultural genes of Chinese people, the cultural skills of institutionalised inheritance and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learning from the past instead of imitating the past are the 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s, which cultivate the practice subject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literacy for the humanistic economics.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economic ethics; cultural resources; human capital